

旧燕知春

——俞平伯人生智慧

JIUYANZHICAO

YUPINGBORENSHENGZHIHUI

周文毅◎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旧燕知草

——俞平伯人生智慧

JIUYANZHICAO
YUPINGBORENSHENGZHUI

周文毅◎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燕知草：俞平伯人生智慧 / 周文毅 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7

ISBN 978-7-213-07496-7

I. ①旧… II. ①周… III. ①俞平伯(1900-
1990)-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4093号

旧燕知草——俞平伯人生智慧

周文毅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 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周 游

责任校对 朱 妍 朱志萍

封面设计 周奇英

排版制作 杭州希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半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3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7496-7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旧燕知草，去去就来（序）

孙昌建

几天前我收到文毅先生的电话，知悉他写了一部关于俞平伯先生的书，一部关于俞老人生智慧的书。周先生希望我能为他写点小文字，原因是我写过“浙江一师”以及民国的一点文字。承蒙信任，亦因同好，更有好奇，虽有惶恐，但仍觉得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因为有关文化大家的传记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但能独辟蹊径写一本书来说说文人之大人生的，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虽然此前也读过报刊上某些书画家的养生经验谈，但那毕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对俞老等前辈大家的喜爱，已随自己年龄的增长而越发迷恋，何况老人家又是我们浙江莫干山脚下的德清人。

当然也不排除我还有一点私心，但凡亦师亦友者的书稿，我总想先睹为快，现在手稿是罕见了，那么校对稿看看也蛮有味道的，不知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职业病。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俞平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绕不过去的人物。“五四”发轫，他初尝新诗，跟胡适、周作人、朱自清和刘大白等一批弄潮儿结社办刊，执掌教鞭，传播新文化，且留下了宝贵的新文学财富。后作散文，几乎篇篇皆是华章，尤其是写了多篇关于杭州关于故乡的饱含深情的文字，成了我们这个城市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更为人所知的是，

俞老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红学大家，本来这可能只是文学和文化圈内的事情，但却因两个“小人物”在 1954 年的挑战，最终引得某个“大人物”的批示，于是学术争论便升格为一场斗争，从而也成为自 1949 年之后中国第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大事件。

常识告诉我们，学术争论是可以见仁见智的，初出茅庐者当然也可挑战学术权威，权威有点权威的样子，新人一开始有点找不到北，这都是最为正常不过的事情。俞平伯这一辈都是从民国过来的。那个年代鲁迅够厉害了吧，几乎跟所有大家都有过论战，包括俞老的好朋友顾颉刚，鲁迅先生还写小说影射过他，但那也没什么事情呀，也没听说顾先生要反鲁迅，他也只是找机会反驳，或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鲁迅也更不会抓住顾不放，因为不可能做到啊。学术的事情应该姓学，最好的方式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而当年的俞老毕竟还是天真了，包括当年的他的那一批朋友和同事，都是太天真了。

怎么办呢，《红楼梦》不能继续做梦了，研究不行了，不能说自己的话了，那就抄书吧，他和大他四岁的杭州籍夫人一起抄《红楼梦》，竟然把整整八十回给抄了下来（“文化大革命”后手稿也竟能失而复得），这是何等的毅力和修炼啊，真的，这就是真爱，这更是豁达，因为《红楼梦》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她不属于某一个人，无论你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当然，从今天的角度说，你抄一遍也是需要本事的，你的书法功底，你的眼力，你的耐心，你的细心。应该说我看不少民国名人的手札，认认真真，工工整整，那些蝇头小字都极具美感，这就是俞老他们这一代文化人的精神写照。由此看来，所谓文房四宝，在中国文人心中那不仅仅是工具，更是

一种寄情托志。

还有比如办昆曲社，这在今天看来也是美事一桩，同时说明当时的政治气候也还没有完全赶尽杀绝。这又跟俞老的出生地，包括他和夫人的修养兴趣有关。文毅在此还特别写到他们后来也努力想编写现代革命新戏，但最后还是无“剧”而终。

更为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即使俞老已是“死老虎”一只，但最后还是带着夫人去了河南信阳罗山的“五七干校”。其时俞老已年届七十，夫人已经七十四岁高龄，本可颐享天年，举案齐眉，却仍要去接受劳动改造。二老不怨天不悲地，他们粗茶淡饭，相濡以沫，跟老乡和气相处，跟同事更是同患时艰。其中我读到作家荒芜给俞老盖衣服送温暖这一细节时，真有一种无言的感动，那真是人性的光辉啊！

也许每个生命的个体，在面对生和死、尊严与屈辱等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极其细微的体会和难以言说的痛苦，比如老舍愤而自沉团结湖，但钱锺书夫妇却能在“五七干校”平静地送别要回北京的俞老夫妇。这是为什么呢？此书作者文毅阅历丰富，读书又好发现，他的厉害之处，是从俞老的文字中找到了缘由：“一是自爱，我们站在爱人的立场上，有爱自己的理由。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们之间，这不是一个梦。三是前进，惟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惟有更好前进。四是闲适，‘勤靡馀暇心有常闲’之谓。如此，我们将不为一切所吞没。”

不仅“不为一切所吞没”，还要继续前行，这可能正是俞平伯先生的人生大智慧吧，或者说是俞家这个中国文化名门的生命密码和文化基因。因为就我所了解的俞家，除了俞平伯先生的祖父是体弱多病之外，曾祖父俞樾和其父俞陛云都是八旬老人，俞樾更是活到了88岁的高寿。也可能因为兴趣，我

也搜罗过从俞樾（1821—1907）到殷海光（1919—1969）中国的一百位文化名家的生卒年月，其平均年龄是76岁，这是很了不起的，最高寿者为马寅初、晏阳初和周祖谟，皆是一百周岁，而像冰心、季羨林、钱穆、梁漱溟等都是高寿者，而俞平伯先生在这一百位中，排名第十六位。这当然是闲话了，似跟智慧二字无关。

文毅先生的这部书稿，史料翔实，引证皆有出处，尤其走访俞老先生的子嗣，不少都是第一手的材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熟谙俞老生平及其人生的诸多亮点之后，能够驾轻就熟，从十个维度来展开俞老的人生智慧，这就不是一般的鸡汤之作，虽然那也是有点营养的。现在可以这么说吧，如果说一部书也是有生命的话，那么以前我们从俞平伯先生的《燕知草》是读到了这个生命的前世部分，而这一部《旧燕知草：俞平伯人生智慧》既让我看到了芳草如萋的春意，又有春燕飞翔升腾的快意。

今天为写这则短文，我上午特意去了一下西湖，春意盎然又乍暖还寒，我特意在孤山边的俞楼门口站了一会，那进去看的游客还是相当多的，于是想起先生在《湖楼小撷》一文中曾引用过的一首诗——

我们的湖山，姿容变幻：

春之花，秋之月，

朝生辉，暮留霭；

水上拖一件惨绿的年少裙衫，

山前横一抹浓青的婵娟秀黛。

游人们齐说：“去来，去来。”

我也道“去来，去来。”

.....

由此我想到此篇小文似乎该用这样一个题目——旧燕知
草，去去就来。

是为小序。

2016年3月24日

目 录

CONTENTS

旧燕知草，去去就来（序） … 孙昌建	1
相逢一笑泯恩仇	1
吾师胡适亦诤友	31
亲友相慰赖吾庐	52
手抄《红楼》拾昆曲	78
故乡田园归去来	106
杭州西泠不了情	129
挨批犹不废红学	151
沉浮“文革”不畏难	167
梅开二度晚霞红	202
临终抱憾奈何天	235
• 后记	257

相逢一笑泯恩仇



20世纪50年代的俞平伯

1954年9月，两个业余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青年李希凡和蓝翎，在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当年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文学评论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著名学者、作家、红学家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观点。认为其“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俞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

红学家的窠臼，并在《简论》一文中更进一步地加以发挥。”“把考证观点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分析上来了，其结果就是得出了这一系列的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结论。”

两个从来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在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的地方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本属于学术争鸣的文章，居然立即被9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半月刊第18号全文转载了。不仅如此，新中国文坛上赫赫有名的该刊主编、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雪峰，还亲自撰写了“编者按”，

加在李、蓝的文章之前。冯雪峰在“编者按”中称，“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即使放在现在，人们也众所周知，无名的年轻作者要在大报大刊上发表文章是很难的，然而，李希凡和蓝翎却继《文艺报》转载他们最初发表在母校学报上的文章仅10天时间，又在当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版第24期上，发出第二篇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观点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而且该文章也获得加“编者按”的待遇。

又时隔6天，更高不可攀的待遇降临到两个才二十出头岁的李希凡和蓝翎身上：10月16日，领袖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他在信中引用他人讥讽李、蓝不过是两个“小人物”的说辞，支持李、蓝敢于批评作为“大人物”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提出要批判胡适思想体系。最新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披露，“此信附有毛泽东批阅过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由此可见，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两篇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观点的文章，当时曾经获得过领袖批示参阅件的政治待遇。

于是乎，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便一夜成名天下知了。而在上个月——1954年9月3日，刚刚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俞平伯，却在须臾之间跌入了大批判的渊藪。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时起时伏，时猛时缓，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又曾掀起过高潮。尤其是1974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署名“梁效”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不停——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更是宣称：“二十年来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乃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今后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然而，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大力平反纠正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却没有得到平反纠正。一直到1986年1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借该院文学研究所举行“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庆贺会”的机会，做出新的结论，才对这一事件进行平反纠正。至此，俞平伯的这副已经戴了整整32年的政治枷锁，终于得到真正解脱。

通过上面的简叙可见，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本意是想与大学者俞平伯展开学术批评的，却不经意间惹出了一场浩大的政治风雨。但让人啧啧称奇的是，1979年，其时尚未获得正式平反的俞平伯，居然能与李希凡、蓝翎坐在一桌吃饭、敬酒，真正做到了鲁迅所谓的“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第二年，他还应两人主动索要，各赠他们一幅书法作品。这到底是气度，抑或是智慧？

且说两个“小人物”当时确实年轻，李希凡26岁，蓝翎22岁。两人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都还是共青团员。他们“挑战”俞平伯的时候，已经从山东大学毕业，李希凡刚刚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蓝翎则刚刚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师。正因为他们年轻，也就充满

着冲劲，敢于公开提出批评，敢于挑战权威，尽管这种批评和挑战不成熟甚至可能站不住。当事人之一的李希凡，事过34年后就在《我和〈红楼梦〉》一文中承认过：“这两篇文章，今天看来，是粗疏幼稚的，值不得文学史家们认真推敲。”

尽管是“小人物”们的“粗疏幼稚”之举，但却着着实实地让俞平伯长时间地当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其实，俞平伯并非出生资产阶级家庭，而是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兼传统文人的家庭。尽管如此，其祖上一直到他本人却都是社会的顺民。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世。他于1900年1月8日出生在苏州马医科巷的祖居曲园内的乐知堂。虽然他后来是在姑苏城里长大成人，但原籍却为浙江德清。浙江德清的俞氏，与梁启超出身的广东新会梁氏、陈寅恪出身的江西修水陈氏、翁同龢出身的江苏常熟翁氏，并称近代中国四大文化名门，代代都出过不少名人。

俞平伯的高祖父俞廷镛（生卒年不详），号南庄，虽世居农家，却耕读有成，70岁时赴省应试考中举人，因浙江巡抚吉公见其年事已高劝其让出名额，他才弃功名重回田庄，后来竟成一段试场佳话。

俞廷镛的儿子俞鸿渐（1781—1846），字仪伯，号剑花，清嘉庆丙子科举人。曾任知县，后在江苏常州等地开家馆授徒。著有《印雪轩文集》二卷、《诗集》十六卷、《随笔》四卷、《读三国志随笔》一卷。

俞鸿渐生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就是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生于浙江德清乌巾山下南埭村（现为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金火村）。其于清道光



清未经学家、教育家俞樾（1821—1907）

三十年（1850年）考中庚戌科进士，即离家赴京任翰林院编修，后又任河南学政（主管河南省考试招录工作）。后因御史曹登鏞劾奏他“试题割裂经文”而被罢官，便携家移居苏州专心著述。以后，他又先后在苏州、杭州、上海、湖州、德清等地讲学，一生著有《春在堂全书》五百余卷，是为清代著名教育家、经学大师。

俞樾生有二子二女。其大儿子俞绍莱（1842—1881），字廉石。他虽未应过科举，却于1876年当过直隶省北运河同知。小儿子即俞平伯祖父俞绍荣（生卒年不详），名祖仁，字寿山，其身体很弱，学业不继，有材料说他“以病废”。俞樾的这两个儿子均英年早逝。俞绍荣的单传儿子俞陞云，就是俞平伯的父亲。

俞陞云（1868—1950），字阶青，号乐静居士。他果然不负祖父俞樾“不知他日能朝否”的厚望，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考中戊戌科进士，经殿试，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探花，是俞氏家族历代赴科举考取功名最高者。他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又被朝廷任命为四川省副主考。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他到杭州任浙江省图书



幼年俞平伯与曾祖父俞樾（中）、父亲俞陛云（右）

馆馆长。民国3年（1914年），他被聘为北京清史馆提调，专门编写清史。次年，他的单传儿子俞平伯来上北京大学，他便把家从苏州迁居北京，从此长居京城。他后半生主要是在家著述写字，一生著有《小竹里馆吟草》、《诗境浅说》、《乐静词》、《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记事珠》、《梅花纪事百咏》、《绚华室诗忆》等著作。

在这样的家庭文化背景下，俞平伯自然幼承庭训、家学渊源。他1915年16岁时就考取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师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黄季刚）。在校期间，他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新闻组长，带领同学走访商会会长，要求罢市，并走上街头，劝说商家罢市声援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刚刚兴起时，还不满20岁的俞平伯，就追随老师胡适提倡并实践的白话诗，因而成了新诗坛的一员骁将。民国时期，俞平伯基本上还是在杭州、上海和北京三地的中等师范和高等学府任教，业余从事诗歌散文创作。他留给学生的印象，如他在“浙江一师”教过的学生曹聚仁所言，“诗词修养，深湛得很”，“风流倜傥，自是浊世王孙公子”。他在散文创作上，比较靠近其北大老师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流派，体现一种闲适、知性、雅致的美学特色。20年代初，他受胡适在搞《红

《红楼梦》考证的影响，在与北大老同学顾颉刚通信探讨《红楼梦》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一本红学著作《红楼梦辨》，一时间，他便成为以胡适领头相对王国维、蔡元培“旧红学派”而言的“新红学派”奠基人。

民国时期，俞平伯虽然很少过问政治，但也绝少随波逐流，既不在民族危亡时投向日本占领者，也不在国民党执政时加入其队伍。他虽然不能说一贯追随共产党，但他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者，其思想却是比较左倾的。他拥护共产党最早的一件事，是1949年1月26日，北平还在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的掌控下，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他，与许德珩、闻家驊、储安平、龚祥瑞等32位文化名人发表和平宣言，一致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八项主张，“以求达到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全国人民及创造民主进步中国之最后目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执教的俞平伯满怀喜悦。他作为九三学社的一员，与组织内的同仁们频频往访中共代表。他还积极参加中共组织召开的有关座谈会，听取周扬介绍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状况。他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郭沫若，还与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茅盾、田汉等重逢热烈话旧。3月22日，在北京饭店，他被选为由郭沫若任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的37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备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5月4日，他作为五四运动见证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将五四运动和全国解放赞誉为“两个大时代”。7月1日黄昏，他冒雨去先农坛体育场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集会，回来后，多年不写新体诗的他，激动地创作了一首新体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



1949年12月大众诗歌社成立大会后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冯至、萧三、钟敬文、俞平伯、艾青、臧克家、卞之琳；中排左起沙鸥、邹荻帆、袁水拍、徐迟、吕剑、严辰、力扬、彭燕郊、田间；后排左起马际融（大众书店发行部主任）、马丁、郭鏞（大众书店经理）、赵立生、徐放、李景慈（大众书店编辑部主任）

发表在7月11日《人民日报》上。同年，他先后当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委员。

开国大典举行过后的次月27日，新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召集俞平伯、林庚、钟敬文、黄药眠、魏建功、浦江清、赵万里等具有古典文学深厚造诣的专家学者开会，提出要校勘整理出版一批古典文学作品。次年（1950年）7月，这一名为“中国古典文艺丛书”的文化建设项目，正式由文化部艺术局组织实施，要求系统整理自汉乐府迄明清俗文学为止的中国古典文艺作品，并出版发行。俞平伯承担了校勘整理《红楼梦》